

深论

脱贫成果巩固，还要体制机制助力

□张照新

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开启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清醒地看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存在一系列挑战。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把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十四五”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一个重要内容。落实中央要求,就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完善体制机制,为脱贫人口构建一个包括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幸福生活安全网。

首先,保持扶贫政策稳定,实现有序转型。“十三五”时期的脱贫

攻坚战,集全社会之力,实现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完善,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超常规发展,让贫困户通过产业增收、就业增收、资源增收、权益增收,形成合力,实现了贫困户收入跨过贫困线。这一目标的实现,既得益于贫困地区自身发展条件的改善和贫困户的努力,更得益于政策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离开现有的支持政策和各种帮扶措施,贫困地区很多产业的持续发展将面临很大挑战,农民增收也难以保障。保持现有扶贫政策的稳定性,是贫困地区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稳步脱贫、避免返贫,要留出缓冲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脱贫后,在脱贫攻坚期内仍可继续享受现有的国家扶持政策。

其次,加大培训和指导支持,

增强发展软实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仅仅有硬件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生产经营者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目前很多特色产业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很多是依靠驻村工作队,依靠外界帮助力量,而贫困户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经营管理能力还远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产品质量和品牌竞争力也不够,很多依靠消费扶贫解决销路。要真正实现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软实力。要把更多资源集中在对贫困地区生产经营主体的培训和辅导,由人的素质提升,带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提高,实现持续发展。

再次,加快发展政策性保险,构建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农业政策性保险,但目前政策性保险主要集中在

大宗粮油领域,很多蔬菜水果等特色产业还没有被纳入。而且现有的政策性保险的保障水平还非常低,主要是弥补物化成本投入,难以覆盖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不能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为了更好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应利用扶贫资金,探索发展全成本保险,真正为当地主导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

最后,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为脱贫人口提供兜底保障。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是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因此,要加大对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的投入力度,提高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推动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持续提升,增强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来源:《光明日报》

声音

乡村建设行动要建物也要树人

乔金亮在《经济日报》上撰文说,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以来,乡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相关新闻接连不断。

笔者认为,乡村建设行动可以有多种路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农业的特点,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不能违背乡村发展的规律。如果简单排斥农民、破坏乡村形态,甚至发生诸如强制合村并居、农民被上楼等,必然影响农民幸福感,这是对乡村的破坏而非建设。乡村建设的目的是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而要关注农民的多元需求。乡村建设只有尊重和依靠农民,文化才能传承,产业才能兴旺,治理才能有效。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都不能越俎代庖。

没有物的建设,农村必然落后。但是,如果没有人的建设,农村也得不到全面发展。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握好软硬件之间的平衡,既离不开基础设施和产业支撑,也要重视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为此,必须加快补齐乡村建设短板,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推动实现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条件大体相当。把脱贫攻坚形成的整套有效办法移植到乡村振兴中,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大振兴”。

村规民约不能任性违法

莫一尘在《新京报》上撰文称,四川绵阳的小伙子邓俊再婚生子在给孩子上户口时,社区干部说按照村规民约要先交纳1万元公益金,因为不愿多交钱,他一直没能为孩子成功办理户口。当地塘汛街道印制的《上户审批表》需要经过社区、街道等三级签字盖章,最后才能到派出所办理上户手续。据悉,这一“土政策”与当地拆迁补偿有关。上世纪90年代,当地社区组织因为担心户口增加,会摊薄统征统转后的土地款等收益,便制定了这项村规民约。

媒体曝光此事后,当地派出所已经为邓俊儿子办理了户口。据邓俊介绍,其村组调整了村规民约,上户口不收费了,但是如果参与分房、申请社保等村福利政策,还是需要缴纳公益金。笔者以为,即便上户口不收费了,调整后的村规民约里“参与分房、申请社保等村福利政策还是需要缴纳公益金”的条款仍旧于法不容。

一方面,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涉事社区的这一村规民约明显超越了法定职权,僭越了法律红线,应当予以废止。

另一方面,这一“土政策”的存在也离不开当地有关部门的纵容,这是行政部门乱作为、行使权力打小算盘的典型案例。不仅涉嫌违法,还与近年来国务院不断强调的简政放权方针背道而驰,鉴于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此及时纠正追责。而类似的不合情不合法的“土规定”,也该尽早被清理。



轻装上阵

鲁楠 画

让“数字农业先锋”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王猛

以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先行者的探索与引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时代的来临,无疑为冲破城乡藩篱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武器”。一批批数字赋能的农业先锋异军突起,成为促进城乡交流的“桥梁”和“推手”。他们拿起手机当农具,让农民成为新职业,努力消解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森严壁垒,破解城乡二元难题。

城乡之间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乡各要素资源无法自由流动,工农业之间很难实现良性循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有利于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进农业工业化和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那么,“数字农业先锋”是怎样的群体?农村农业需

要怎么样的“数字农业先锋”?

“数字农业先锋”能够令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数字农业将一切可用资源数字化,通过消除不确定性来优化生产全流程。有了先锋企业的参与,就能将风光土热温等自然资源及种养技术等进行有效整合,推动农业全链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例如,“极飞科技”“大疆农业”等在今年疫情期间利用无人机等助力春耕春管,正大集团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实现“舌尖上的安全”,都是借助数字力量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数字农业先锋”能够不断壮大人才队伍。尽管数字化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数字农业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让机器取代人,而是为人类赋能。先锋企业有技术也有动力去挖掘培养综合型涉农人才,进而把更多农民吸引到数字化浪潮中来。在“广东百万农民线上免费培训工程”中,腾讯微视等企业全方位链接城乡,在为广大农民提供免费培训的同时,也给农产品插上

了“数字”翅膀,使其飞到城市居民的餐桌上。

“数字农业先锋”令城乡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那些经过数字浪潮洗礼的先锋企业和人物,不仅可以将更多乡村产品带至城市,也能将先进的数字农业新理念播撒到田野乡间,使之在农产品生产、销售和乡村治理等领域落地。比如,阿里巴巴、拼多多等企业通过电商直播等形式带动农产品销售,千鲜汇利用微信群和小程序等创新家庭消费社交电商模式。在这些先锋的沟通协调下,城乡人员物流交往正日益密切。

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数字农业先锋”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所以,扶持与培养“数字农业先锋”,需要政府部门有所作为,及时总结推广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让生态系统更加有活力,更加完善。如此,这支先锋队必将为构建新型城乡工农关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南方日报》

□张向阳

通过建立乡村治理的应急机制,湖北宜都交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湖北保卫战“宜都答卷”;在浙江鄞州,点开基层公权力智管平台,村务办理一目了然;在宁夏固原,乡村治理积分可在超市兑换商品……前不久,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34个案例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体现了推进乡村治理的新进展和新成效。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实现乡村善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地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风俗习惯等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推广乡村治理创新性典型案例经验。由此来看,通过试点示范,鼓励各地在乡村治理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创新,总结推广典型案例,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现实所需,是推动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具体举措,也是典型引领、推进工作的有效方法。

深入研究各地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和科学方法。比如,山东省平原县创新“党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以及海南省琼海市的“四级化事法”,都是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纵深下沉,实现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不断延伸;浙江省建德市“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安徽省宁国市发动群众念好“议、助、管”三字诀,侧重点在于发挥基层群众的主动性;山西省长子县多元调解带来乡村治理的“四降两升”、河南省新密市的“一村一警”,聚焦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推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实践证明,抓住强化党的建设、创新议事协商形式、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加强县乡村三级联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解决突出问题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能够有效纾解乡村治理中的难点和堵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需要破解的挑战和难题,强化实践探索、总结成功经验,显得尤为重要。各地在积极吸收借鉴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开拓创新,让更多更好的经验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一定能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来源:《人民日报》